

舊曲譜新調

以世界
框架寫

中國

近代史

(下)

●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師範大學歷史系、所教授）

兩岸分合多種觀點

兩岸分合的歷史是中國人近代史的重要片段。由清末及日據時期兩個時段的兩岸關係，可知由世界框架比由中國框架，更能掌握其基本脈絡。

(一) 清末的兩岸關係

一八六〇年台灣曾對世界各國開放淡水、打狗（今高雄）兩大通商口岸，使台灣的商貿對象由原來之只有中國大陸擴大而包括歐美、日本。這期間，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商貿關係究竟是加強，還是式微？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九〇年間有十位學者，包括晚近的大陸學者，在民族主義史觀的解釋模式下，都認為在西力東漸之後，西方以其優越經濟力量打擊中國的商貿活動，造成清末兩岸關係的式微。但以往學者所用來說明清末兩岸關係式微的證據多半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證據。事實上，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曾經受

到世界性經濟蕭條的波及，台灣也連帶受到影響，而在咸豐後期一直到光緒二十年間（約當十九世紀下半葉），即使有港口淤積的問題，就整體而言（個別商家之起伏及短期波動不包括在內），無論就其往來於兩岸之間的帆船數、在台灣沿岸城市所設的郊行數目，或是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進出口商品數量而言，都有所增加，而與世界性經濟大致較為景氣有一致的發展。

以往有學者認為台灣在西力東漸之後轉而依附於英國資本之下，實則清末台灣非常倚重大陸上的山西票號與錢莊資本；清末台灣由對外貿易所賺取的財富也可以購買更多的大陸物資。這些發展使清末的兩岸政治經濟關係更為加強而非式微。清咸豐末年至同治光緒年間，兩岸經濟關係更為加強，可以印證晚近越來越多的世界經濟史學者所說：亞洲內部貿易在西力東漸以後更為擴張，中國商人在東亞海域之內居於舉足輕重地位。

台灣也與若干世界經濟史學者所觀察到的東亞或西印度洋一些個案一樣，在西力東漸以後發展對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資本市場的雙重依附關係，而與其觀察到的拉丁美洲、中東、部分非洲等資本原較薄弱地區，在西力東漸以後發展對英美資本發生絕對的依賴關係，有所不同。

清末的這段發展，使一八九五年以前的三百年當中，約有一百八十年的清領初期，大陸是台灣的唯一貿易對象，另外約一百二十年中，海盜或漁民時期約二十五年，荷據、鄭領共六十年及清末三十五年期間，台灣雖以世界各國為最終市場，但或是出售大陸商品，或是經由兩岸貿易進行世界貿易，與大陸一直維持密切關係。在這三百年兩岸有密切關係期間，台灣不斷受容大陸累積幾千年的農業與商業文明。

如與朝鮮比較可以得知台灣之有深厚的中國影響。將同受日本統治的朝鮮與台灣互

相比較，就一九三七年每人國內生產淨值而言，如以日本為指數一百，台灣為五十五至六十，朝鮮為三十至四十。研究過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學者，很多都提到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相對日本殖民的朝鮮人民具有經濟理性，只要是利之所在，不必訴諸政治的驅迫，就願嘗試新的技術或經濟發展機會。一九一一至一九三八年間，日資較少有機會介入台灣的米穀流通過程及九十九人以下之中小工廠的餘地；反之，日資則主導朝鮮的這些產銷部門。雖然日本政府早在本國、朝鮮、滿洲設立商會，但遲遲不敢在台灣成立，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唯恐台灣本土的商人，相對其他殖民地的本土商人勢力雄厚，有從事民族運動之虞。因此在日本佔領台灣以前，台灣社會本身原已厚實的經濟發展潛力，不可忽視。農商經濟在中國，原本源遠流長，如貨幣經濟在清代中國遠比日本殖民以前的朝鮮發達。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朝鮮的不同，實為中國與朝鮮之不同。

(二) 日據時期的兩岸關係

由民族主義的觀點，日據時期的兩岸關係是，一段血濃於水的關係，以目前台灣，國中教科書提及之日據時期前往大陸台灣人的歷史為例，只講到臺灣革命同盟會的光復臺灣運動。但如就真正歷史發展看來，日本領台卻是兩岸之間，由合轉分的重要起點。日據台灣對台灣的一大影響，在於日本領台

，使台灣與大陸的長期經貿關係由密轉疏，一九〇二至一九三七年間，台日貿易值為大陸貿易值的十三倍強，台陸貿易值中，還約有一半是日貨經台灣出口至大陸。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貿易，須繳納國際關稅，與日本之間則無關稅之徵課，是如此變化的關鍵因素。日本透過現代的交通工具如鐵路、輪運等，更加使台灣與日本緊密相連。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五年間，日本、朝鮮、滿洲、臺灣之內所有政府經營的鐵路可用互通的乘車月票，即一張票可以換搭各地的火車。繼一九三六年之後，此一「交通普羅克」(Transportation Book)更拓展到陸海空聯運。在以上聯運辦法之下，僅以一張聯絡票，可隨處搭火車、飛機或輪船，在終站可加總計價，自行加、退錢。一九三八年旅客行李在這整個陸海空運輸網之內也可以轉運。

這樣一個將台灣由中國分出而納入日本的發展，使一八九五年之後的台灣與中國有了一個很大的不同。一八九五年之後的中國財政，因為賠款與戰爭造成長年的赤字。在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中國雖然也有戰債，在一八九五年前夕，大致均已清償。甲午戰爭的賠款，則為清廷常年歲入之三倍，一九〇五年的庚子賠款，更為清廷常年歲入之五倍。民國以後，戰費經常佔政府歲入之八〇%，由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八，政府財政赤字更增為七十七億倍。台灣之為日本統治，不但免於此項財政負荷，在日本領台

之初，尚受日本財政補助。之後，臺灣財政相當豐富，歲入是以官業收入為主，田賦次之，臺灣的財政收入多再用於臺灣，其中以事業費居多。

甲午戰爭以後，列強之競相到中國投資甚而與中國發生衝突，日本及歐美各國紛紛採用金本位，於是要以其棄用之銀傾注中國亦為一因，台灣則隨日本之於一八九七年改行金本位而改行金本位。台灣於一八九五年之後，免於大陸所受之戰禍，是台灣超前大陸發展之一重要張本。

在台灣相對中國大陸免於戰禍的情況下，再加上日本政府的政策，中國少有發展的科學農業，在台灣有了顯著發展。日本政府的擴張政策，北進一直重於南進，朝鮮則為日本北進的基地，其經濟發展以配合軍需發展的工業為主，農業不像台灣強調，一九一一至一九三八年間，朝鮮人口雖約為台灣之五倍，但日本政府在朝鮮的農業投資佔日本在該殖民地投資的比例約僅台灣的一半。戰後台灣循著戰前基礎，以農業扶養工業，除經濟逐步成長之外，所得分配也因此一直較朝鮮平均。同時，日據時期草根型的南方領袖逐漸崛起，也奠定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初基。與日據時期的農業並行發展的工商業，有些也隨著日本對中國的擴張政策，而拓展到中國。

日據時期，在大陸投資的台商，除了有些經營非法行業如鴉片煙館、妓女戶等之外

，開商店者頗多，經營項目包括日常用品、鐘錶等現代用品、工廠、服務業……，另外還有電話、電燈、鐵路、馬路等大型的現代建設。

一九二三年間，孫中山倡導發展近代工業，泉州一帶擬置設電氣事業，雖由當地九位知名人士集資一萬餘元，然而還是不夠。因為台灣的板橋林家與泉州的龔家有姻親關係，林家於是被邀入股，獨力投資八萬餘元，占投資總額的八十五%。如此才因而得以購買一二〇匹馬力煤氣發動機，配七五千瓦發電機一台，泉州也因此開始有了電燈。此等台灣資本、技術於一八九五年以後流入大陸，如與一八九五年之前資本、技術普遍由大陸流入台灣兩相對照，可見一八九五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日據時期資本、技術由台灣流入大陸，且有大陸勞工來台的情況與目前也非常接近。

這些日據時期前往大陸的台商常以插著日本旗的船隻開進中國領海。台商在大陸所開的店與不平等條約底下外商在中國設的公同一樣，稱做「洋行」。台灣籍民因入日本籍可得到日本領事館的保護，亦可在中國免繳釐金，並利用日本在大陸所設立的學校、醫院及發行的報紙。在日據時期前往大陸的台灣人當中，商人原居多數，而多達兩萬。對於日據時期前往大陸的台灣人的歷史，台灣的國中歷史課本以約四百位台灣人的抗日史，取代約兩萬日本化的台灣商人的歷史，

原是民族主義史學的必然結果。在民族主義史學的情懷底下，談日據時期前往大陸台商的日本化過程，多少是一種傷痛。但以日據時期前往大陸的台灣人的歷史為例，民族主義史學並未能寫出較大多數人的歷史。

在此同時也看到，一八九五年以後原來不想當日本人而由台灣移往大陸的台灣人，在一九一六年軍閥開始混戰之際，因為台灣政府已由武人政府轉為文人政府相對開明安定，紛紛皈依日籍，連原屬中國籍者，亦有設法取得日籍者。

由上可見民族主義史觀把清末原本加強的兩岸關係寫成式微，把日據時期原本分裂的兩岸關係寫成結合，由世界框架重新審視兩個時期的兩岸關係之後，卻可看見其由合轉分之關鍵性發展。

世界史觀世界格局

有關兩岸的分歧，目前無論是台灣或是大陸的政府，都說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國共對立的結果，是中國的內部問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約有六十萬有科技知識和行政經驗的人才由大陸移入台灣，對台灣的發展是一大助力。

如與韓國比較，同樣有美援的協助，韓國將約有一半的美援拿來購買肥料，台灣在像尹仲容這群經濟官僚的領導下，發展肥料的進口替代，而使台灣的肥料自給率由日據時期之約為十分之一增為戰後初期之約有三

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以一九六〇年為例，台灣肥料產量約為韓國的四倍強，買肥料之餘的美援，台灣可用以購買較韓國為多的機器以發展工業。如與大陸比較，則這批台灣的官僚護持了為日本政府在台灣強化了的中國傳統的農商文明，也是台灣經濟較大陸平順發展的重要理由。

但就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兩岸對立而言，國際因素依然重要，戰後台灣除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之外，一直以美日兩國為主要貿易夥伴。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九一年間東西冷戰的格局底下，經由美國之影響，台灣與日本的關係較韓國建立得早，也發展得多。

日據時期的兩岸分歧加上戰後的兩岸分歧，使由漢人開始大量持續移民到台灣的一六〇〇年算起，至日本領台的一八九五年共約三百年間，兩岸之間是合多於分，而由一八九五年至今的一百年，兩岸之間則是分多於合。

造成一八九五年之後兩岸百年分裂的根源是日本在馬關條約中索取台灣。有關馬關條約中台灣之被割讓給日本，也因國人常由中國框架思考中國歷史的積弊，常只抱怨李鴻章之「宰相有權能割地」，而忽略了根本問題在於日本早有佔領台灣的企圖。

策動甲午戰爭的伊藤博文，與明治時期諸多日本的領導份子，係為幕末時期吉田松蔭所辦「松下村塾」之受業弟子。在日本被美國打開門戶的第二年的一八五四年，吉田

松蔭即主張佔領包括台灣在內的東太平洋弧形島嶼群，以為抗拒歐美的軍事防波堤。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原是為著「扶植韓國獨立」，原無信心同時進攻台灣。但在日本於平壤、黃海獲勝而穩操勝券之後，內閣總理伊藤博文緊急請大本營：「直衝威海衛並掠奪台灣」。在甲午戰後中日要議和之前，日本的陸海軍將領曾有過激辯，陸軍堅持佔領遼東半島，以為北進之一基地，海軍堅持佔領台灣，以為建立太平洋霸權之一跳板。結果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日本佔領台灣，海軍如願以償。海軍將領代表即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日軍在馬關條約簽定之日，攻陷澎湖，對割台提供極為勉強的佔領事實。

除了大眾較熟知的軍事動機之外，日本領台，另有其經濟動機。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時，美國公使狄龍，即曾以台灣資源豐富，慫恿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佔領台灣。一八九五年日本參謀本部編纂的《臺灣誌》也提到台灣，可為日本之棉布市場。一八九二年日本駐福州領事更指出：「台糖係日本輸入品之中最具重大關係者，其輸入日本之數量，每年約為三十萬擔，達海關銀六七十萬兩。」而代表新興資本家的《東京經濟雜誌》則以日本對台糖的依賴為緣由，主張佔取台灣。早在荷據、明鄭時期，日本已是台糖的主要市場。日本之進口大量台糖，乃因日本自身所產糖不敷所需，及地理位置接近台灣，交通方便。康熙末期台糖漸以華北

為主要市場，日本市場，因為鎖國之故而致重要性降低。一八七一年因中日修交條約的簽訂，日本人才可至安平、淡水貿易，台灣人民得至橫濱、函館、大阪、神戶、新潟、長崎等港貿易。一八六〇年代，高雄順和行的陳福謙開始自己運糖售於橫濱，一八七四年在橫濱設商館，這是台日貿易從日本鎖國之後最盛的時期。直到一八九六年，往來於台灣與日本間的中國式帆船，尚有一千五百艘。一八六八至一八九五年間，中國大陸進口台糖總量為七百一十六萬擔，日本進口台糖總量則為六百一十九萬擔，而與中國大陸進口量相當。明治維新後，隨著經濟繁榮，對台糖的需要量，更為增加。故乘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的勝利，索取台灣。

在一九七九年之後，中國大陸隨著改革開放，其與國際經濟的關係不斷加強。一八七七年以後，美日經濟成長的放慢腳步，台灣本身以及亞太經濟力的提升，冷戰時期的結束，使台灣與大陸的經濟由長期的分裂轉趨融合。在這兩岸由分轉合之際，兩岸關係，由於其長遠的國際歷史背景，也就成為國際人士觀察中國大陸，能否擺脫偏狹民族主義而參與國際社會的試金石。

偏狹的民族主義，經常造成認知方面的差距以及決策方面的遺憾，而這些發展，又很弔詭地，可以溯源於中國由十八世紀以來與世界經濟的緊密相連，從而引發的商貿衝突。鑒於近代以來日本之所以領先中國，在

其人民以世界為其活動以及歷史記憶的空間座標，而中國人以中國或以東亞為其活動及歷史記憶的空間座標，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再度將與世界經濟更加緊密相連之際，兩岸的中國人如何在長期分歧之後，彼此截長補短，共同拓展中國人的世界座標，也就成為當務之急。以世界框架寫的中國人的近代史，建構中國人恢宏的胸襟，也就成為中國人免於再遭國際圍堵，而能積極參與國際社會之一重要精神建設。

龔祖遂先生學術基金會提供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近代中國區域史會議論文集、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農業、尹仲容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現代經濟的起步、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清末大陸來台郊商的興衰、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日本殖民地鐵道史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甲午戰爭與清季貨幣金融改革潮、中國現代史論集、八年抗戰、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日據時期台灣商工會的發展、經貿與政治文化認同、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閩台關係檔案資料、日本外交史料、台灣肥料的政府管理與配銷、在國際經濟演變中的台灣經貿關係、日本併吞台灣的醞釀及其動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學報、台灣之糖、台灣省通志稿、茶、糖、樟腦業與晚清台灣等書。